

蔡若水

延安回忆录

赤脚天堂

湖南美术出版社

赤脚天堂

延安回忆录

蔡若虹

赤脚天堂

湖南美术出版社

赤脚天堂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人民中路103号)

蔡若虹著 责任编辑：刘海珍 责任校对：彭英 伍黎黎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字数：12万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5356-1370-5/J·1287

定价：11.50元

作者小传

蔡若虹原名蔡雍，笔名雷萌，江西九江人，1910年1月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20年代当国民革命军攻克九江后，他在由共产党人主持的九江市党部创办了《火炬画报》，绘制了不少反帝反封建的美术作品。不久，蒋介石叛变，推翻了国共合作，开始在九江对工人、学生进行大屠杀，他被追逃亡到南昌，当时只有十六岁。

30年代他在上海美专求学，同时参加了上海左翼美术家联盟，毕业后曾先后与陶行知先生、邹韬奋先生合作，在他们主编的《生活教育》、《大众生活》、《新生》、《永生》等刊物上发表了很多的漫画作品。此外，他又在《漫画生活》、《生活漫画》、《美术生活》、《自修大学》、《妇女生活》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漫画作品。这些刊物不断被国民党禁止，他

在反禁止中不断地坚持创作。他在 1938 年离开上海赴香港，由廖承志同志介绍，他与妻子夏蕾同赴延安。

40 年代他在延安鲁迅文艺学院美术系执教，先教漫画，后教创作实习，1941 年后任美术系主任，1940 年 8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 年 5 月长女蔡晓晴诞生。他在鲁艺先后参加了整顿三风、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与华君武、张谔一同到枣园会见了毛主席。他还参加了开荒纺线等生产活动，在政治思想学习与美术创作实践方面也不甘落后，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才随鲁艺大队离开延安。

1946 年初，正值军事调处时期，他曾赴北平在钱俊瑞主编的《解放三日刊》任美术编辑，发表了不少讽刺画。不久，报社被封，他回到了晋察冀边区的报社任美术编辑，先后参加了山西平定、河北石家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在《晋察冀日报》上连续发表了《苦从何来》漫画二十余幅，对贫雇农开展诉苦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49 年 2 月，他在人民日报社任美术编辑，与范长江一同进北京城，这是北京解放的第一天。1949 年 6 月，他又调往新建立的文化部艺术局工作，在毛主席亲自授意下，撰写了文化部第一个指示《开展新年画创作》，引起了全国美术家对新年画创作的重视。不久，毛主席又指示文化部创办大众图画出版社，由他负责编绘了不少新的连环图画（小人书），打开了一个以民间美术为开路先锋的崭新局面。

50 年代他为新年画评奖做了不少工作，他开始改行，专门撰写评论文章。1954 年由文化部调往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后任副主席。在北京解放之初，次女蔡胜和三女蔡利诞生。

在文革 10 年的 6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初期，他被贬为黑帮头子，多次遭批斗后被转入文化部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在那里他参与了多种多样的生产劳动，还偷偷地写了不少旧体诗词。

70 年代后期，他被平反并且恢复工作，先在文艺研究院，后在美术家协会与中国画研究院，直到 1980 年后才离职退休。

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他曾先后出国访问过苏联、东德、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也是在此期间，他曾当选为全国人民大会第三、第五、第六届人民代表，担任过研究院的领导成员和全国文联的荣誉委员，他担任美协副主席长达四十余年。

1997 年 2 月，他的老伴夏蕾因病逝世。

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他的著作陆续出版，有画册《苦从何来》，诗集《若虹诗画》，文集《蔡若虹美术评论集》与《蔡若虹文集》。在他的晚年，还出版了《灵犀小唱》（诗集）与《理想的美比实际生活更美》（文集）。他还写了两部回忆录，一部是关于 30 年代的回忆录《上海亭子间的时代风习》，一部便是这本关于 40 年代的延安回忆录《赤脚天堂》。

目 录

赤脚天堂	(1)
晚 会	(12)
关于动手动脚	(19)
宏观世界的开辟	(27)
兵与歌	(35)
灯花灿烂的夜晚	(44)
生活是诗 形象更是诗	(52)
教学与实际相结合	(61)
枣园一夕	(69)
“人山”在怒吼.....	(78)
讽刺的讽刺	(85)
一粒鼠屎一锅汤	(93)
乱弹琴.....	(102)

生命的凯歌·····	(111)
同志之间·····	(119)
三个红小鬼·····	(130)
有两套基本功·····	(138)
原型与变型·····	(147)
火炬如龙 斗志如虹·····	(156)
天堂在火线上延伸·····	(166)
后 记·····	(177)

赤脚天堂

“我赶快脱下皮靴
因为我发现
所有走进天国的男男女女
都是赤脚
啊，延安
好一个赤脚天堂”

我到延安不过两天，就诗兴大发，几乎每天都要在小本子上记上几行马雅可夫斯基式的长短句，这就是其中的一首。

读者也许要问，你为什么称延安为天堂呢？既是天堂又为什么都是赤脚呢？光着脚丫子走路的人能够走进天堂吗？

且慢且慢，请听我仔细道来。

我是1910年降生于长江南岸一个所谓书香门第的家庭，在历代祖宗的牌位上，都标记着二品、三品、四品之类的级别，大概他们都在封建王朝做过高级官员。只有到了我父亲这一代才开始门庭破落。在这种贵族之家的眼里，凡是光着脚丫子走路的人都叫作“穷鬼”，事实上也只有种田的“乡巴佬”和城市中的苦力才打赤脚。这样一来，赤脚便成为穷困而又能吃苦的人们的代名词。

其实，延安人并不是时刻都赤裸着双脚，连做勤务打杂的红小鬼也不缺少一双布鞋。可是延安人不穿袜子倒比较普遍。夏天，光着脚丫子穿草鞋、布鞋、凉鞋；冬天，光着脚丫子捅进棉鞋或者毡靴，这种不穿袜子解放了的赤脚穿鞋的方便、爽快和乐趣，我是在实践以后才体会到。

至于我为什么把延安叫作天堂，这要从我对天堂二字的理解来说明。我认为，天堂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它必定建立在贫困而艰苦的物质基础上，第二是它必定要有一个崇高而广阔的精神世界作先导。而延安人，恰恰都是两只赤脚牢牢地站在这个既贫困而又荒凉的黄土高原上，而那些戴着军帽的头脑里都有一个令我又惊又喜的洋溢着崇高理想的精神世界。他们用预见性的乐观主义精神去克服贫困和艰苦，他们用创造性的劳动实践去开辟理想的天地，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符合我心目中的两个特点。我不得不把这个桂冠戴在延安的头上！

序幕揭开，言归正传。

我是在1939年5月，经过七个多月的旅程，才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越南、昆明、贵阳等地到达延安的。在这

七个多月的旅程中，我经过了大城市、中小城市、大乡镇、小村落，从繁华走到荒凉、从富裕走到贫困，这样一站又一站地走过来。抗日战争在社会生活中投下的阴影在我这个长途旅行的人的心目中越来越沉重、越来越逼近，这就使我不但不能不想到延安的荒凉和艰苦，我想到我在上海与三哥告别时的对话。三哥说，听说延安很艰苦，你怎么受得了？我说，受不了我也要受。现在艰苦逼近眼前，我应当打起精神，检查一下我的决心是否能够兑现。

从香港出发时是五个人，除了我和夏蕾以外还有张谔和他从广州请来的两个制版工人，所以路上并不寂寞，可是经过四川重庆时，张谔和两个工人都留在新华日报社工作，所以到达延安时只剩下我们夫妻两个。

大卡车停在延安城的南门外，时间是傍晚，一车二十多个人都很快地走散了，只剩下押车副官没有走，这是个三十来岁的老红军，又红又黑的长脸上有一双聪明的眼睛，身上是旧灰布军装，赤脚上穿着双布鞋，他知道我们是香港廖承志介绍来的，对我们特别亲切，从西安出发，沿路上车下车、吃饭打尖都非常关心。现在，他等大伙儿走完了，就从车上把我们的行李搬到附近一家旅舍里，然后对我们说：“你们放心休息吧，我替你们带个口信给鲁迅艺术学院，明天一早一定有人来接你们。”之后就握手告别了。

我和夏蕾走进旅舍一间简陋的平房，里面是土墙土炕，炕上铺着一张席子，炕桌上点着一盏麻油灯，昏黄的灯光一闪一闪地照着我们的影子在土墙上晃动，此外什么也没有。我一边把铺盖打开放在炕席上，一边心里在琢磨：“明天该有个毛驴来接我们吧。”

谁知道第二天一老早就来了两个 30 年代认识的老朋友，一个是山东漫画家丁里，他脱下了很时髦的西服，换上了一身灰布军装，一个是上海漫画家华君武，他也把那飘飘然的绸大褂换成了军服。两个人都是打赤脚穿着布鞋，两个人都比从前瘦了黑了，只是那艺术家的派头不见了，却都精神振作，有一些军人气概。他们没有带毛驴来，却带来一根又长又粗的木头椽子，是给我挑行李的，这使我心里暗暗发呆，我对艰苦的估计太轻了。他们看见我和夏蕾仍然是旧日打扮时，仅仅是点头微笑而已，没有半句寒暄，连那个曾经在轮船上对我喊叫“你要来呀，你要来呀”的华君武，现在看见我来了也没有一点亲热的表示。他们的眼睛老是盯着我的衣箱和口袋，华君武对我说：“哟，你简直是搬家搬到延安来了！”这句话里分明有刺。丁里问我：“这个大口袋里装的是什么？”我说是两床棉被，他们都轻蔑地笑起来，丁里说：“你不知道，我们住的窑洞就等于一床大棉被。”他们二话不说，七手八脚地把衣箱上的绊子和口袋上的铁环穿在木头椽子上，一前一后地抬起来就走，头也不回地对我们说：“你们跟着我们走吧。”他们还没有走进城门，嘴里就“嘿哟嘿哟”地互相唱和起来。我的行李并不重，两床棉被顶多二十斤，衣箱顶多二三十斤，不过五六十斤的重量就值得两个男子汉“嘿哟嘿哟”吗？这分明是同我开玩笑，这玩笑中也分明有刺，刺我这个空手走路的贵客，我无可奈何，只好笑，只好跟着他们一起笑。

鲁迅艺术学院在北门外的山脚下，从南门走到北门，整整穿过延安城内一条街。当时正是日寇飞机对延安城大肆轰炸之后，整个延安城内，看不见没有倒塌的房屋和门窗，连

一点败壁颓垣也没有，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成了一个清一色的瓦砾场。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强盗对中国共产党的仇恨之深，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强盗的打击之痛。我没有沮丧，却暗暗高兴：“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我这个30年代念念不忘的信念，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印证。

然而，一走出城门就是山，到处尽是山，不长树木的山，连野草也稀稀拉拉的荒山。那不黄不赤的颜色和不高不低的形象不但不讨人欢喜，还令人生厌！荒凉，荒凉，天下无比的荒凉！谁知道，仅仅过了一天，我的印象完全改变了。歌声出现在这些荒山里，口号出现在这些荒山里，奇迹出现在这些荒山里，原来无比的荒凉正是天堂不可缺少的背景，天堂的典型环境！

我一到鲁艺就马上会见了30年代认识的吕骥和张庚，也会见了副院长沙可夫和党委徐一新，他们都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军装、赤脚、布鞋，红红黑黑的脸膛，草莽英雄的气概。他们初次和我见面时都说着相同的话：“你来得好，你来得是时候！”我想，我好在哪里呢？我脚上还穿着皮靴哩！

我们马上搬进了半山腰上一间新开辟的窑洞里，我在美术系当教员，夏蕾在文学系学习。

我在这里要重点回忆的，是我到鲁艺第二天傍晚我看见的一幅无比壮丽的图画。那天已是暮色苍茫的时候，鲁艺的同志们一早开荒去了还没有回来，我站在半山腰的窑洞门外等他们，我的眼睛老盯着山下，没有想到一阵歌声却从我背后的山顶上飞过来，我回头仰望，只见一轮圆月正从山梁上露出大半个亮晶晶的面孔，五六个扛着锄头的青年汉子（里

面有丁里)正唱着歌从山梁上从远处走近,上衣搭在锄头柄上,裤腿卷在额膝之上,他们昂首挺胸大踏步地走着,那歌声响亮、雄壮而又深沉。当他们跨着一轮圆月走过时,我看见,那月亮在他们赤裸裸的腿下晃动、晃动、晃动!我看呆了,尽管时间只有一刹那,但那种有声有色的壮丽景象,牢牢地镶嵌在我的头脑里,永不褪色,我心情的激动是难言的。一等到他们走到山下,我就对着丁里高喊:“我明天也要开荒,我明天也要开荒!”丁里也高声回答:“你放心,漏不掉你,漏不掉你!”我高兴地回到窑洞里,就着麻油灯光写诗、写诗。

“红军的赤脚

跨过万水千山

赤脚的我们

专门用笨拙的锄头

向荒凉挑战 打碎荒凉

我们的歌声 惊醒了

穷人的恶梦

我们的阔步

从地狱跨进天堂

在我们的锄下

世界正在变样

你看 你看

那个正在发抖的月亮

在我们的赤脚之下

摇晃 摇晃 摇晃”

我写这些诗，不过是一个有文学癖好的心灵与天堂美景的巧合，是理想与现实的拥抱，又惊又喜的热烈拥抱。其实，延安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天堂美景，光靠写诗是说不清楚的。应当用散文写，而且要用老百姓的通俗口语才能说得清楚明白。

我到延安不过七八天，和我接触的延安人给我一个最鲜明的共同印象就是真诚，像十足的赤金一样真诚。有了真诚，才有人对人对事的热情；有了热情，才有脚踏实地的实践，才有无穷无尽的创造性劳动，才能够把又穷又荒凉的陕北高原改造为人间天堂！

第一个以真诚待我的延安人就是那个押车的老红军，只要他没有离开延安，总是隔几天就到鲁艺来看我们，问我有什么困难他能帮助我解决。此外，鲁艺党委徐一新、美术系的华君武、王曼硕、摄影师吴印咸、中央党校的罗沛霖、周扬的夫人苏灵扬……都先先后后地来看我和夏蕾，大概他们都理解刚到延安的日子是不太习惯的，所以一见面都异口同声地问：“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回答得干脆：“没有，没有，困难一看见我们就吓跑了！”笑、笑，延安人总是笑，十分真诚地笑！

其实，我是有困难的。尽管我一到延安就一见倾心，可是我是一个在鱼米之乡长大的人，几十年的习惯一时改不了，我最大最突出的困难就是不能吃小米饭，每天早上的小米稀饭我能吃，中午和下午的小米干饭却总是在嘴里转来转去不肯进喉咙，夏蕾着急地轻轻对我说：“你吞下去呀，你吞下去呀！”我说：“不是我不吞，是它不肯下去！”这种困

难是延安暂时不能解决的，所以我们绝对保密。夏蕾想了一个办法，每天早上的小米稀饭多打一些，一顿当作三餐吃，我们只带了两个漱口杯当饭碗，没有东西多装稀饭，只好学别人一样用空的罐头当饭碗。大概这个空罐不干净，稀饭又从早上留到下午，不到一星期，我就病倒了。先是发高烧，后来拉血，高烧常常使我昏迷不醒，拉血从点点滴滴到一大滩。夏蕾和徐一新干着急也无用，只好请了两个陕北老乡抬着担架把我往二十里外的拐岭医院送。我迷迷糊糊地躺在担架上，面朝晴朗的天空，头脑仍然在活动：“…我不配…作延安人…骨头埋在延安…死也闭眼……”实际上我的灵魂已经跨进了天堂的大门！

拐岭医院没有医院的设备，就和美术系没有纸张、颜料一样。一大排窑洞和几间平房就是主要家当。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没有对症的贵重药品。用什么治病呢？真诚，除了真诚还是真诚。当晚上我从昏迷中醒来，张眼四顾时，一盏油灯下两个穿军衣的医生守在我身边，摸额头、号脉、让我喝口水，比大城市的医生还要无微不至地看护着我！一个月后我的病好了，有些病不重的伤兵来到我的病房，对我说，这个医院的大夫真好，一个脸上有麻子的是朝鲜人，另一个说东北话的是有名的文学家黄树则（他的文章我读过，就和他本人一样的实事求是）。

一场大病（急性肠炎）赶跑了我不能吃小米饭的恶习。后来我不但能吃而且吃得很香。从医院回鲁艺时，鲁艺已经从北门外搬到了桥儿沟的天主教堂里。我住在东山的窑洞里，生活大大地改善了，凡是东山教员，每天都有一顿大米白面，延安的艰苦是一步一步地撤退的。

东山窑洞很多，全住着鲁艺音乐系、文学系、美术系的教员。一天三顿饭，大家都喜欢坐在窑洞外面的“土沙发”上吃，大家一见面就熟，来自四海的人们谈起话来也海阔天空，但是都很自觉，不打扰别人，吃完饭就钻进窑洞各干各的事。如果是明朗的月夜，三个五个便集合在窑洞外面谈天，这样可以节省灯油。

从北门外到桥儿沟，生活多少有些变化，但是永不变化的就是创造性劳动和乐观主义精神，这是延安人的两个随身法宝，也是延安这个天堂的主要标志。

最初，我看见丁里用两枝油画笔倒过来当筷子吃饭，又看见很多同志用空罐头当饭碗，这都是在北门外，我为此而感动，而写诗。搬到桥儿沟以后，我看见冼星海折的一根柳条儿（桥儿沟有几棵柳树）当作指挥合唱的指挥棒，我更感动。我在上海见过冼星海一面，西装革履，是个很英俊的广东青年，他曾经在法国餐馆里当过捧盘子的白衣侍者。现在他完全变了样子，军衣军帽，热天总喜欢穿一条齐膝盖的短裤，下面是赤脚、草鞋。我看过他多次指挥合唱时的背影，那笔直笔直的身材，那挺胸昂首的姿态，那随着歌声舞动的右手和柳条儿，那赤脚草鞋，比那穿燕尾服的音乐大师美多了，美极了！这种天堂美景，和那月亮在歌声中、赤脚下摇晃的天堂美景同样地令我心醉！建国后我有好几次想用水彩把这两幅美景画在纸上，可是我画出来的形象总没有记忆中的印象那么真切、那么动人。

搬到东山以后，令我感动的新鲜事更多了。最先是王式廓用锄头在他窑洞里的墙壁上打了一个长方形的窟窿，作为书柜，我大为欣赏，也想学样在自己的窑洞里打一个。这高